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3期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o. 3 2007
(第6卷)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6)

晚清民国时期两广蔗糖业和城镇经济网络互动初探

唐咸明

(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4)

摘 要: 晚清民国时期,由于外力和内力的双重作用,两广的蔗糖业和城镇经济网络都经历了由繁盛、衰落再到兴起嬗变的过程。商人介入蔗糖业领域促进了城镇经济网络和蔗糖业的楔合。由于历史和地域的关系,广东的蔗糖业和城镇经济网络都比广西发达,并且形成了对广西的强力辐射作用。

关键词: 晚清民国; 蔗糖业; 广东广西; 城镇网络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0202(2007)03-0098-09

一、研究问题的缘起

广东和广西在历史上俗称岭南或两广。同处中国第三大水系——珠江流域,属于热带亚热带季候风地区,全年气候温暖湿润,雨量充沛。广东年平均气温21.7℃,降雨量1586.3毫米;广西年平均气温20.98℃,年平均降雨量989.1毫米,特别适宜热带和亚热带植物甘蔗的种植生长[1]109。应该说,在南部中国甘蔗种植的四川、广东、广西、福建、台湾、江西、浙江、湖南、云南等9个省份中,广东的气温、降雨量仅次于台湾年均气温22.20℃,年降雨量2100毫米的水平,排名第二,广西的条件稍差[1]109。两广是一衣带水的兄弟省份,秦始皇征服岭南,设置桂林、南海、象三郡,是两广同隶中央政权的开始。岭南是百越民族的祖居地,中国是甘蔗的原生地之一,百越民族中的壮侗语族先民是我国境内最早掌握种蔗制糖的民族[2]。有宋之前,岭南地区较少开发。自南宋以降,随着国家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岭南地区由于大量中原移民的迁居而进入了快速开发时期。明清时期,广东社会经济飞速发展,成为全国经济发展剃度最高地区之一,形成了商品经济最强力辐射源[3]207-210。与此同时,广西由于偏居粤西,地理条件和人文条件的局限,明清500余年间逐渐落后于广东,成为受广东经济辐射最强省区之一[3]223。在晚清民国时期,两广沿江沿河的城镇经济网络日趋定型和成熟。在广西形成了桂林、柳州、南宁三城市为区域中心,以梧州为总中心的树状"承东启西,西控东趋"的沿江城镇经济网络格局[3]190。广西的甘蔗种植大体沿江布局。在清代前期的广东,广州、佛山、陈村和石龙四大镇大致呈东西走向,恰与广州——澳门南北走向构成"T"形架构,形成复杂完善的有强大内外辐射力的"T"形城镇经济网络[4]50-69。就经济运行的角度而言,则形成了广州、佛山二元中心市场[5]。晚清民国时期,由于外力的冲击,处于西风东渐最前沿的广东城镇经济网络发生嬗变,由于澳门和佛山的衰落,香港的崛起,使岭南二元中心市场发生位移,形成了穗港双中心"T"形城镇经济网络[4]50-69。珠三角、韩江流域、雷州半岛和钦州湾是广东主要蔗区。1880年代后汕头的开埠和崛起,广东的蔗糖业销售中心位移粤东。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两广地方实力派不约而同地开始了糖业现代化的尝试。总之,两广蔗糖业与城镇经济网络经历了和谐相处共荣共衰的发展历程,探讨两广蔗糖业与城镇经济网络的互动效应是有重要意义的。

二、清末民初两广蔗糖业和城镇经济网络的互动发展

经过明清以来500余年的社会经济嬗变,到19世纪80年代以前,广东的甘蔗种植业继续发展,达到较高的水

收稿日期:2007-05-06

作者简介:唐咸明(1967—),男,广西灌阳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城市发展.

平。洋糖在 19 世纪 80 年代之前冲击绩效不大，所以蔗糖业仍然发展并推动城镇经济的进步。广东甘蔗种植区域以珠三角为主，粤东集中在韩江流域，粤西有雷州、徐闻，海南岛“有蜡蔗竹蔗二种，竹蔗煮糖，唼以蜡蔗，为桂琼产，四时不绝。”[6]廉州府的钦州合浦一带，种蔗制糖也很发达。广东制糖业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以珠三角为重心。屈大均《广东新语》载：“糖之利甚溥，粤人开糖房者多以致富。盖番禺、东莞、增城糖居十之四，阳春糖居十之六。”[7]19 世纪 80 年代以前，广东的制糖技术仍然停留在手工生产状态。糖房的规模小，富裕之家，一户开一糖寮，中下农则采取互助联营的办法，“榨时上农一人一寮，中农五之，下农八之十之。”[8]由于糖业利润丰厚，吸引了大量糖商前来投资，加速了广东制糖业向商品经济过渡，广东食糖成为全国重要商品。

蔗糖业与城镇经济网络的互动效应，主要通过商人从事糖业经营等活动表现出来。一般而言，在蔗糖业发达地区，蔗糖业与城镇经济网络的互动效应就密切一些，反之，效应就不明显，体现了蔗糖业与城镇经济网络发展的不平衡性，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表现。广东蔗糖业的发展，推动了城镇经济网络的发展，而城镇经济网络的畅通，又为蔗糖产品的销售提供了便捷的通道，从而带动了蔗糖业的发展。广东主要蔗糖产区集中在番禺、东莞、增城、阳春、罗定、新宁、澄海、徐闻、雷州、钦州、潮州等地，这些地区圩镇经济发达。而蔗糖业与城镇经济网络密切联系的是普通圩市。普通圩市是商品经济兴起的产物，数量最大，分布最广，遍及广东各个角落。据统计，清代雍正乾隆年间（1723—1795 年），珠三角圩市数量已达 570 个[4]88。这些圩市最大特点是集散商品，即一方面收购当地产品，供应外地市场；另一方面把从外地运来商品销售给当地居民，起着承上启下作用，是商品流通网络中最基本环节。它们是糖业营销体系集产、供、销于一体的始结点，成为蔗糖业一级集散地[9]。糖商投资收购小糖寮的成品糖，在村镇圩市集中，再销往外地。如合水圩，是阳春北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其中一个比较大的圩镇。是当地农副产品集散地，农副产品丰富，吸引了各地商人。附近农民种的糖蔗都在土糖寮加工黄片糖，再运去市场出售，每圩黄片糖几百担，大都被外地商人购去[10]61。蔗糖业推动城镇经济网络发展，主要通过商人在乡村圩市的成品糖的购销活动，增加商品流通，繁荣市场方面表现出来。乡镇圩市的成品糖得以汇集之后，糖商又将产品汇集到二级集散地，也就是区域性市场。一般是建立在沿江沿海交通便利的城镇或大城镇。如广州府的清远镇，潮州府的潮州港，高州府的徐闻港，廉州府的北海港，以及后来的海口和汕头等，构成了 19 世纪 80 年代以前广东的二级和三级集散市场。如潮安县城，就存在专营成品糖的袁镜堂、鸿裕、鸿发、茂生等糖行，当时叫糖行街。与米行街、豆行街等构成了 13 个专业街[11]156－157。经营食糖生意，构成了潮安县城商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如洸洸镇，地处连江下游，水陆交通发达、商业兴旺，古往今来为重要集镇。洸洸镇农民都习惯于种蔗。清末以来有六十多间土糖寮，年产土糖不少于二百吨。价值十万大元以上。同时，在榨季期间还可吸收一千名人到糖寮做工，解决了冬闲的剩余劳动力问题。据道光版《英德县志》载：“洸洸府有街市十一条，铺店数百家，苏杭绸缎，海味杂货、油米糖酒，编织印染，金银白锡、茶楼客栈，钱庄典当样样俱全。逢农历五、十，赶集买卖，商贸云集、街市兴旺，来往客商多达万人。”[12]182－183食糖成为洸洸镇重要的商品之一。石龙地处东江下游干支流分水交汇处，晚清以来是东江流域重要的商品集散中心，商业非常发达，与广州、佛山、陈村齐名。以糖街为中心的制糖业，是石龙具有一定规模的行业[13]56。成品糖最后汇集到省内、国内糖业销售中心。当时广州是全省最大的糖业批发集散地。19 世纪 80 年代以后，汕头开埠并逐步发展成为粤东乃至全国最大的糖业出口中心[9]。特别应指出的是，广东商人还通过特殊精明的做法，为蔗糖销售抹上了神秘的光彩，也最能说明蔗糖业和城镇经济网络的楔合效应。在赣西北鄱阳湖畔的吴城镇，清末后期有较多的广东商人前去经商，并建立粤东会馆。当时吴城镇的赣商为了阻止粤东会馆的建立，竟垄断了当地全部建筑工料的买卖，禁止售与粤商。精明的粤商采取一袋糖夹藏一块广东青砖的偷运办法，花费了两年的时间备足砖料[14]。应该说，在两年偷运青砖的过程中，广东往北过大庾岭、骑田岭沿线城镇网络如韶州府城、南雄府城，乌径市、梅岭古道的沿线圩镇等在食糖北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带动了这些城镇经济网络的正常运行。再如，广东地处岭南，气候炎热潮湿，城镇居民大多喜爱甜食，可以滋补消暑，也是蔗糖业与城镇经济网络楔合的表现。清代以来，由于甘蔗种植十分普遍，广东人对甘蔗有深厚的感情，城乡居民岁时用糖习俗比较普遍，并且具有较强的文化内涵。城镇居民用糖呈现多元化的特点，糖品是必备的贺岁品[15]。正月十五元宵节，二月春雷祭社，八月中秋节，十月榨糖饲牛节，十二月腊月制作糖环、各式糖果等作贺年品等，都离不开糖。在蔗糖发达区惠州，城市居民对糖丸钟爱有加，大凡喜庆活动，脱不了糖丸。供奉神明祖先，要糖丸作供品；合家团聚或久别相聚，也要糖丸作好的“兆头”；嫁女娶妻，要糖丸作礼；做寿华诞，必备糖丸；童养媳除夕夜完婚，也要糖丸作媒，小夫妻吃过糖丸后，才敢入洞房。因糖丸一圆、二甜、三好食，又有团圆吉样之意，故久传不衰[16]159－160。这也是蔗糖

业与城镇经济网络融合的表现,蔗糖业的发达,丰富了城镇居民的日常节庆饮食文化生活。

然而,19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洋糖的大量倾销,地处西风东渐最前沿广东的蔗糖业受到沉重打击,迅速走向衰落。鸦片战争之后,珠三角地区由于洋糖、台糖大量涌入,土糖备受打击,蔗田面积锐减。如著名汕头老蔗区"蔗田多改为桔园。"[4]50种蔗历史悠久的南海"山坡之田,旧多种蔗,……近因利微,已有每况愈下之势。"[4]50在新宁(台山),"邑内山坡之田,旧多种蔗,近因利微,蔗田抛荒。"[4]50其他各地蔗糖区也有类似情况。取代甘蔗的主要有花生、水果和杂粮等。这是战后广东甘蔗生产的第一次低潮。1921年广东花生面积占全国41%,居第一位,产量次于山东。以后广东花生在全国一直占有相当地位,主要是甘蔗萎缩时占地奠定的基础[4]50-69。蔗糖业的衰落,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城镇经济网络的相应衰退。如清前期天下四大巨镇的佛山因洋货倾销手工业破产和西江水道淤塞等影响,迅速走向衰落,上游广西的大米食糖和大宗土特产品或直走香港,或通过龙州关或经过北海港出海运抵穗港,不再经过佛山。使佛山的成品糖和其他商品贸易一落千丈。由于战后五口通商,对外贸易中心由广州转向上海,原来由广州北上中原的陆路食糖贸易路线的沿线城镇网络也迅速走向衰落。明清以来,广东的蔗糖销售外省的途径有三:一是沿东南海运送到吴越京津;二是溯北江,越五岭,入两湖地区;三是经西江到梧州,再越灵渠转运长江水系地区[17]。19世纪80年代以后,北江和西江两条蔗糖运输沿线城镇网络因此受到影响走向衰落是必然的。尽管蔗糖业不是造成城镇经济网络衰退的主因,但是西方列强大量廉价商品的强烈冲击,使广东的冶铁业、纺织业、蚕桑业等或早或迟地受到打击而衰落,城镇经济走向衰退,蔗糖业的衰落是其中的诱因之一是肯定无疑的。受蔗糖业影响最大的是发达蔗糖业产区的城镇经济,尤以珠三角为典型,这是经济发展不平衡使然。蔗糖业衰退的状况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有所改变。

回头来看同一时期广西的情况。20世纪30年代以前广西的蔗糖业虽然远不及广东那样发达,但也没有出现广东蔗糖业因受外力强烈冲击而迅速走向衰退的大起大落的情况。明清时期,广西蔗糖业有所发展。清前期,桂西的百色县"果属,甘蔗亦榨汁精炼为糖。"[18]46《郁林州志》载:"蜡蔗甘蔗干大节密,汁浓宜生啖,竹蔗肉蔗惟绞汁煎作糖,利颇厚。"[19]71浔州府:"甘蔗,各县出。"[20]2895可见,当时广西的甘蔗种植面积范围不广。由于明清时期广西的城镇经济网络大多沿江而设的特点,桂林、柳州、南宁、梧州四大中心城市都处于沿江沿河的交通要道上,使得广西圩镇体系和市场中心呈树状分布[21]。明清以来,在交通要道上出现了许多大圩镇,以苍梧县的戎圩,桂平县的江口圩和平南县的大安圩最为繁盛,有"一戎二乌三江口"之称[22]20。三大镇都处于由粤入桂西江要道上。清末民初,广西的城镇等级体系发生了较大变迁,由于省城桂林市场腹地太小,梧州由于地处广西最东端,接受广东经济辐射最强,因而经济发展逐渐超过了其他三个中心城市,使得广西城镇经济网络由总中心桂林东移到梧州,从相对接近克里斯塔勒模式向不断对克里斯塔勒模式背离、悖异的过程[3]192。沿江城镇网络由东向西的轴线分布,有利于粤商对广西城镇经济发育的营造以及经济性移民对广西蔗糖业的开拓,同时也有利于清代以降以水运交通为主要模式的沿江轴线城镇格局对食糖和其他土特产品自西向东的运销。

清末民初,特别是粤闽经济性移民随着粤商的经营足迹大量涌入广西,带来了先进的种蔗制糖技术,使广西的蔗糖业有了较快的发展。如《邕宁县志》载:"竹蔗皮坚,含糖质尤富,专取以榨汁制糖。吾县南路蒲津乡下南一带,所有田亩,十分之八九,改为蔗畲,所产糖额,动以万计。"[23]813民国年间,邕宁蒲庙圩有彭百记、莫均安、韦金兴、时年丰、联记、福诚、祥和等7家糖庄,专门从事蔗糖的收购和销售。县内苏圩、吴圩、良庆等乡镇的蔗糖都运来蒲庙销售,年销售蔗糖在一万吨以上[24]124。贵县"蜡蔗以石罅、覃塘为最著。糖蔗(俗名竹蔗)主产地为苏湾附近,冬季糖厂林立,每年糖之产量平均估计约逾五百万斤。蔗糖之运销,以县城为集散地。"[25]722《融县志》记载:"蔗有蜡蔗,荻蔗,赤昆仑,通常制糖多用荻蔗,旧志未见载,及道咸以前勿可得而详矣。在同治初元,只长安镇东西两岸糖业比较现在,诚有过之无不及。"[26]268位于郁江上游的贵县县城,在近代轮船业发展起来后,由于港口优良而取代清前期郁林和桂平县城的货物集散地中心地位,成为邻近各县的货物集散地[22]49。发达的蔗糖业成为贵县商业繁盛的助推剂之一。当时贵县有福亨、德丰、英记、钜昌、隆恒、发东、恒记等7家糖商[27]261,将收购的黄片糖用轮船运到梧州再转售香港、上海等地提炼白砂糖。长安为融县县城所在地,也是融县第一大镇。位于融江上游,陆路、水陆分别上达湘、黔边各县,下则与柳州联系较便,居融江上游水运要冲,为桂北、黔东南及湘桂边界出入口贸易之总汇[22]29-30。融县所产长安片糖,鲜润明洁,质量上乘,畅销贵州和湖南市场,曾经"长安布庄专以黄片糖易(湖南)洪江布匹。"[26]165综上可以看到,在蔗糖业发达地区,由于盛产蔗糖,通过商人的食糖运销,促进了城镇经济的繁荣和城镇经济网络的正常运行。

清末民初，广西的蔗糖营销网络，按照克里斯塔勒模式，形成四级集散市场网络体系。梧州为蔗糖产品的总集散地和批发中心，是一级中心城市。桂林、柳州、南宁是蔗糖产品的二级集散地，在桂林有漓江、抚河流域食糖产品以及部分广东的食糖产品集散，而后越灵渠掠湘江进入长江流域销售。柳州有桂北、桂西北柳江水系的广阔腹地，柳江上游诸县成品糖和其他货物汇集柳州，然后再下运梧州集散。南宁，外控交趾，内接黔滇，近通廉钦，下达梧州“以达于(广)东省”[3]184。是左右江流域蔗糖产品的集散地。而百色、龙州、宜州则构成了广西蔗糖东运的三级集散中心。其余基层圩镇如平乐，贺县的八步镇，宾阳的芦圩、桂东南的贵县等则构成了广西食糖外运的四级营销网络点，广大的基层乡村圩市构成食糖集散的最初网点。据统计，清代前期，广西苍邕区 24 州县，有圩市 414 个，到民国时期增加到 470 个；柳桂区 25 州县，清前期有基层圩市 346 个，到民国时期增加到 451 个[22]36。基层圩市数量的增加，有利于蔗糖产品的集散，对城镇经济网络的促进作用是巨大的。这一时期广西城镇居民节庆喜日也有用糖的习俗，反映了蔗糖业与城镇经济网络的楔合。邕宁县“若贺年，则糕粽粉利干肉，端午节，则角黍瓜果。中秋节，则月饼芋头。冬月，则各种腊味海味。至寻常问候，肉面糖饼，不拘一格，如遇庆贺，至送银钱者。”[23]1598《榴江县志》记载：“风俗：以银毫给童稚谓之新年彩。客来，款以糕、饼、糖果，出舆邻里亲友，交相敬礼谓之拜年。”[28]46《灵川县志》记载：“礼俗：炊熟糯，以鸡屎藤气泡草白矾等煮水和捣成流质，匀铺成块，剪为小条，炸以香油，胀如气泡，中有细絮，拌以熬糖，裹以芝麻，香甜而脆，谓之麻通，亦曰炮果。”[29]389从中可看出，广西的城镇居民节庆喜日都有用糖的习俗，由于广西城镇网络居民中多民族聚居的特点，决定了其用糖习俗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从鸦片战争到 20 世纪初，广西的蔗糖业继续向前发展，没有出现大起大落的情况，原因有两方面。其一是广西地处边陲的地理位置和交通不便的阻隔；其二是鸦片战争期间广东城乡人民英勇的反侵略斗争，延缓了西方列强对广西的侵略步伐。从中折射出由于地理位置的差异和人为因素影响，导致两广受西方冲击的剃度差异和时间差异。19 世纪 80 年代爆发的中法战争，是广西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肇始。随着龙州(1887 年)，梧州(1897 年)和南宁(1907 年)三关的约开和自开商埠，洋糖随着沿江城镇经济网络自东向西大量倾销广西各级市场，广西的蔗糖业和其他手工业受到洋糖和洋货的冲击而逐步走向衰落。如 1927 年至 1931 年，广西洋糖进口 330260 担/349699 海关两，占进口总值 1.51%；出口土糖仅 19430 担/78125 海关两，占出口总值 0.91%[30]408-409。又如《融县志》记载：“海通之后，洋纱洋布逐渐充斥，…长安布庄当然歇业，因之蔗糖销路亦不如前。”[26]165《信都县志》载：“近年因种蔗利微，该业日渐衰落。”[31]569《邕宁县志》记载：“…当此外来之糖充斥，诚有改良蔗糖业，以挽回利权之必要。”[23]715

清末民初两广蔗糖业和城镇经济网络的先后衰落，仅仅归结为洋糖的冲击是不全面的。洋糖的冲击是把双刃剑，一方面挤占了原来土糖的国内市场；另一方面洋糖的质优价廉，使土糖“制糖之法，器具不精，提炼不纯，色味不洁。”[32]286的弊端表露无遗。同时也影响了城镇市民对国产土糖的消费抵触心理，“香港白糖价贱，民间喜用。”[32]165“车糖不特色味宜人，而又价值相宜，故悦者咸趋就之。”[32]472用洋糖放弃土糖，缩小了土糖的市场份额。洋糖和土糖的盛衰对比，实质上是两广蔗糖业被强行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之后价值规律作用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商人在经营中掺假造假行为也损害了土糖的形象和声誉，“榨蔗成糖，一经糖商之手，复加搀入壳灰等物，使变色气，成黄或白，以便于发售，而符买者之好耳。职是之故，识者相率咸以车糖为更合所需，以视土糖为可有可无之物，相去不啻霄壤。”[32]472虽为少数不法商人的举动，但影响极坏。这种惟利是图的短视行为影响了城镇网络居民取洋糖舍土糖的消费心理。商人参与蔗糖销售，是蔗糖业与城镇经济网络楔合的关键环节，在明清以来，商人参与收购集散食糖，通过以城镇会馆(或商会)网络的形式，建立稳定的销售网点，使食糖销售渠道畅通，丰富了商品内涵，促进了城镇商品经济的发展，使蔗糖业生产实现正常的资金周转。在商人介入蔗糖业领域初期，积极作用是主要的，后期则消极作用明显。另一方面糖商只注重对蔗糖业流通领域的投资营造，忽略了对蔗糖业生产领域的关注，固有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没有因糖商的介入而改变。糖商忽略了对蔗农生产技术、肥料、品种、生产体制等关键问题的改良，而是将资金投入放贷领域，使甘蔗生产畸形发展，竭泽而渔，导致蔗农日趋贫困化。20 世纪 30 年代初，著名经济学家千家驹等在考察广西的蔗糖生产之后，总结说：“蔗农所受高利贷之压迫，则为绝无可争之事实。故广西之蔗糖生产，不仅为如何增进生产，兼应为如何免除蔗农后顾之忧。”[33]8-9广东“历来糖商息借银号款项，转借与糖庄，期以糖抵；……而今年秋收之际，蔗农无以应糖庄者，十居六七；糖庄无以应糖商；糖商即无以应银号。全埠糖业，殆有铜山西倒洛钟东应之慨。”[32]325日本《支那研究》也正确指出：“(中国糖商)惟知垄断利益，常加种蔗者以种种压制，农业上如何改进，绝不顾念。”[34]上述分析切中要害，说明晚清民国时期，两广蔗糖

业和城镇经济网络衰落,是内外双重因素作用的结果。

三、20世纪30年代两广地方实力派糖业现代化尝试与城镇经济网络嬗变

20世纪初,面对洋糖泛滥土糖衰落,国家财政危机加剧的情况,糖业界知名人士如山东袁文钦、广东陈步程等,多次吁请中央政府采取措施,奖励植棉制糖,保护民族工业[35]261-276。北洋政府于1914年4月11日颁布了《植棉制糖牧羊奖励条令》,同时饬令各省成立农会,建立农林试验场[35]514-515。由于不合理制度安排和战乱频延,北洋政府实施的措施效果不大。但是农林试验事业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得以保留下来。国民党政府建立后,采取一些发展国内经济、维护国家利权的措施,如发起关税自主运动,裁撤厘金,减免部分杂税等;1933年5月,颁布第六次糖税则修改案,大幅提高进口糖的税率[36]。为20世纪30年代两广糖业发展提供了宽松的政策环境。1929年又爆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国际性的糖业危机遍及各个产糖国家,在这种有利情况下,在维护利权运动中,两广地方实力派走在了最前面。以推动蔗糖业现代化为突破口,增强地方实力,发展城镇网络经济,两广地方实力派表现出了惊人的相似。

1932年,陈济棠向西南政务委员会提出了《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奠定了20世纪30年代广东经济发展的政策基础。接着陈又任命岭南农学院教授冯锐为农林局长,冯起草了《复兴广东糖业三年计划》[36]。广东政府投入巨资(固定资产总值500万美元,相当于东毫1500万元)建立了番禺市头和新造、惠阳、揭阳、顺德和东莞等6家现代化机制糖厂。其中市头糖厂日榨蔗能力为2750吨,顺德、东莞和惠阳3家糖厂日榨蔗能力为1000吨,揭阳糖厂日榨蔗750吨,新造糖厂日榨蔗为500吨。采用亚硫酸法和石灰法的制糖方法,6厂每日产糖能力700公吨,酒精15000多公升[37]107。同时为了保证糖厂的原料蔗供应,陈济棠政府于1933年在珠三角的主要蔗区,设立新洲、磨蝶、陈村、农林局4个甘蔗繁殖场,试验推广爪哇蔗种POJ2714、POJ2725和POJ2883,依托农业推广机构,种植优良品种,取得了显著成效[36]。砂糖产量显著增加。如从1933年到1936年,广东的砂糖产量分别为119.71万公担,159.98万公担,182.98万公担和172.68万公担,分别占全国同期砂糖总产量的46.81%,52.61%,53.41%和48.35%[27]339-340。

陈济棠主政时期推行的糖业复兴计划,促进了广东蔗糖业的发展,推动了珠三角和其他蔗糖区城镇经济网络的发展。以蔗糖业发达、城镇经济网络密布的珠三角为例,经过一系列兴衰更替,民国时期三角洲城镇体系分为四级。第一级广州、香港,人口150万左右;第二级佛山、江门、肇庆、惠州、澳门五市镇,人口在4-19万;第三级建制镇共30多个,人口一般在1-2万;第四级即乡村圩镇,共350多个,一般为3-5千人,它们除了商业,各级城镇手工业都比较集中,大中城市还有一定的近代工业,各自发挥在网络中的功能[4]100-111。珠三角发达的城镇等级分布体系,便利了该地区蔗糖业的发展,为食糖的运销提供了最便捷的通道。1929年广东蚕桑业衰落,使珠三角甘蔗种植面积复又增加,甘蔗从岗地转到基水地,取代桑基,成为塘基主要作物[4]50-69。清末民初以来,珠三角地区铁路、公路交通快速兴起,形成了四通八达的陆路和水运交通网络。在广东兴建的广三、广九、粤汉、新宁四条铁路干线中,珠三角拥有三条。广三铁路完成最早,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竣工通车,由广州石围塘到三水(今河口镇),全长49公里,全线在三角洲内,工程容易,客货源丰富,可以弥补西江水运之不足。广九铁路始筑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宣统三年(1911年)建成通车。全长178.56公里,跨广州市郊、东莞、增城、宝安三县,称华段;进入九龙地区称英段。全线大小车站34个。华段人烟稠密,市镇殷盛,而英段所过多为山区,人口不多,市镇疏落。新宁铁路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动工,民国三年(1914年)全线竣工,全长127.3公里,起于斗山,经公益、台城、新会、江门、抵北街。这条铁路对改进四邑地区陆上交通作用十分巨大,特别是作为县城和铁路中枢的台城镇发展尤为迅速[4]100-111。20世纪20年代后,三角洲开始修建公路。到抗战前已形成以广州为中心,东路、南路和北路三大干线为主体,向四方辐射的公路网络[4]100-111。同时传统的水运在三角洲仍然发挥重要作用。1932年由九龙往来的外国船舶数居全国各航区之首,压倒上海,而广州则居全国第二位,同年广州港拥有的码头数量为全国各航区第一[4]100-111。1933年在广东八大海关中,三角洲占了五个,即广州、九龙、拱北、江门、三水(其余为琼州、北海、汕头)。进口船舶63904艘、占全省92%,吨位1401万吨,为全省总吨位69%[4]100-111。

由上观之,珠三角发达的交通网络,拉近了城镇经济网络的时空距离,便利了成品糖的运输,缩短了运输时间损耗,有利于糖商对食糖货流和价格行情的把握,促进了蔗糖业的发展。珠三角如此,省内其他蔗糖区与交通网络互动效应也相类似。又如广东6家(珠三角5家)现代化糖厂,都是从美国引进榨糖机器设备,并由美国檀香山铁

工厂承包整个建设安装工程[38]39-40。便捷的海运和城镇之间水运陆运交通网络在笨重机器的运输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又如陈济棠兴建现代化糖厂的举动在省城广州引起强烈反响，糖厂未及建成，一惯精明的粤商已开始打起糖厂招牌做生意了。如市头糖厂 1932 年开始安装设备，由欧籍技工到场负责技术指导，但未及正式投产，广州市面上即有出售该厂商标的白砂糖，原来是一些精明的商人从香港购入太古糖，改换包装以渔利。时人谓之“无烟糖”。其后各糖厂相继竣工，投产上市后，“无烟糖”之名，才为历史陈迹[39]64。可以看出，20 世纪 30 年代，广东蔗糖业发展和城镇经济网络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两者相互促进，绩效明显。

20 世纪 30 年代，广西新桂系以李宗仁、白崇禧等为首，以“建设广西，复兴中国”为口号，大力推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四大建设，以“三自”、“三寓”政策相标榜。在经济方面，积极推进农林试验推广事业，设立农林甘蔗试验场，开始了蔗糖业的现代化建设。1929 年设农业推广部，1938 年设立农业管理处，在柳州沙塘农事试验场试验成功桂蔗一号、二号优良品种[40]。同时省政府组织从广东引进一批爪哇、菲律宾甘蔗品种，后选定优良的爪哇 POJ2878 代替传统竹蔗推广种植，广西进入种植爪哇 POJ2878 品种时期[27]340。清末，曾经在柳州建立砂糖精制所，这是广西机械加工制片糖的肇始，后因洋糖冲击而倒闭[27]11。1928 年，广西实验院开始使用榨蔗机提取蔗汁，制炼糖料。到 1943 年全省有畜力甘蔗压榨机 30 台，离心制糖机 53 台，分布于柳城、柳江、宜山、恭城、临桂、邕宁等 6 个县[27]339。20 世纪 30 年代，广西省政府积极推动制糖业的进步。1934 年投资国币 121.7 万元，在贵县罗泊湾建立广西糖厂，这是第一座现代化的机制糖厂，日榨蔗 300 吨[27]340。主要生产白砂糖[27]123。可惜该糖厂只生产了 3 个榨季，即于 1939 年初被日军飞机炸毁[41]23。使广西的蔗糖业现代化受到顿挫。

可见，广西糖厂也是设立在蔗源丰富、制糖业发达的贵县，原计划设在柳州，由于柳州霜期较长而作罢。由于新桂系的经济现代化建设，蔗糖业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如从 1933 年到 1936 年，广西的砂糖产量分别为 12 万公担，13.68 万公担，25.2 万公担和 24 万公担，分别占全国砂糖总产量的 4.69%，4.5%，7.36% 和 6.72%[27]339-340。

20 世纪 30 年代，交通的快速发展加强了城镇经济网络之间的联系并带动了蔗糖业发展。清末，广西曾有最早修筑铁路之议，中法最初拟建龙州铁路，但在筹办过程中，双方反复进行争辩，直到清朝灭亡，最后没有修成，民办铁路也是如此[42]462-467。湘桂铁路和黔桂铁路修筑是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为军事目的而兴建[43]418-419。1925 年以后，新桂系注重公路建设，在抗战前十余年间修筑公路 6000 余公里，基本形成了全省公路网[22]345。同时注重开发西江航运，1932 年后对桂江、郁江、左右江和柳江等河道进行疏浚，设立水文站、航标等，全年可通航轮渡船 1522 公里，通民船的有 3130 公里，促进了广西水运的发展[43]241-242。20 世纪 30 年代，全省基层圩市有 1000 余处[44]45，比清末民初有所增加。同时梧州有商店 1393 家，南宁有 979 家，桂林有 906 家，柳州有 622 家，四个城市的商业都有所发展[43]248。商业和交通的进步带动了城镇经济网络的发展，也有利于蔗糖业的发展。如甘蔗新品种的快速引进以及肥料运输等，城镇交通网络发挥了作用。商人通过城镇营销网络能准确把握市场信息，促进食糖的流通等。广西糖厂机器设备有切蔗机、压榨机等 35 种，均系美国檀香山钢铁公司制造[41]99。笨重机械从海外运输到贵县罗泊湾，西江水运城镇网络发挥了积极作用。20 世纪 3、40 年代，广西出现了玉林五属商帮（玉林、兴业、博白、陆川、北流），是桂东南地区经济发达的产物，在广西商业史上有重要意义，它终结了广西素无从事长距离贸易的本土商帮的历史，标志着广西具有市场经济自身的发育能力已经开始形成[3]200-201。本地商帮和粤商等外省商帮参与蔗糖和其他货物的流通，有利于蔗糖业的发展和产品的趋东流向。

然而由于铁路和公路修筑较晚，营运处在雏形阶段，发展时间有限，所以 20 世纪 30 年代，以水运决定广西城镇网络排布的总体格局并没有改变，广西之商品“仍十九惟航运是赖”[45]81。尽管水运条件有较大改善，但商品运输速度慢和受季节制约始终是其发展的瓶颈，加上民初以来广西对外贸易连年入超等不利因素影响，使城镇经济网络市场量和质的扩张受到影响，制约了蔗糖业的发展。由于城镇经济网络仍以商业性圩镇为主，只有小部分手工业专业圩镇的产生[22]8。城镇经济网络“无市不趋东”的特征又决定了广西城镇经济格局和蔗糖业发展对粤港经济的依附性较强。同时蔗糖业发展不平衡没有得到改变，桂东和桂东南地区仍然是同一时期城镇经济网络发达区，也是蔗糖业发达地区。应该指出的是，20 世纪 30 年代，糖商放高利贷的情形非常严重。骆君骕指出：“本区糖蔗农均呻吟于资金缺乏束缚之下，而乞灵于柳州少数资本家之前，如所谓（放糖青者），一部分商人多于春初贷于蔗农，订定年终出糖时，须折价以（糖漏）偿还，彼等以五六元一百斤漏糖购回柳州，再自制白糖以出售，每担可赚四五元之利，即资本家攫取蔗农生命之最残酷方式，蔗农于政府捐税镣枷之下，再加上资本家的毒棒，无怪蔗糖业日趋衰落。”[46]67-68千家驹、吴半农等在 30 年代初来广西考察时均指出糖商放高利贷不利甘蔗生产的情形，可知糖商的

介入不仅没有促进蔗糖业商品经济性的增长,反而成为蔗糖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但无论怎么说,在广西相比于广东作为落后地区而言,商人介入蔗糖业,毕竟是蔗糖业和城镇网络楔合的进步。

由上观之,尽管两广于20世纪30年代同时进行了蔗糖业现代化建设,但是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蔗糖业和城镇经济网络的发展程度和楔合度是有很大差异的。

四、结语

综观晚清民国时期广东和广西蔗糖业和城镇经济网络的发展嬗变过程,可以总结如下特点:

第一,呈梯度辐射效应。广东作为欧风美雨的沿海前沿地带,最先接受西方的冲击,也最早经历冲击的阵痛而后作出回应和调整。19世纪80年代以前,广东的蔗糖业仍然沿着明清时期蔗糖业发达的惯性轨道,珠三角的蔗糖业和城镇经济网络互动效应明显。19世纪80年代以后,洋糖、台糖的大量倾销,使蔗糖业受到沉重打击而衰落。而广西由于地理位置的阻隔和广东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影响,19世纪80年代以后才逐步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两广的时间差异是整整半个世纪。广东的蔗糖业对广西影响较大,粤商是广西城镇经济发育的营造主体,粤闽经济性移民开拓了广西的甘蔗种植业。广西的"无东不成市"的经济格局和"无市不趋东"的城镇经济网络走向,表现了广东经济发达区对广西的强烈辐射效应。

第二,呈波浪曲折性发展。由于生产力水平的局限,甘蔗糖业对于自然灾害以及内外战乱反应较为敏感,晚清民国时期两广蔗糖业发展一直不稳定,对于城镇经济网络的推动绩效是有限的不平衡的。

第三,传统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决定了蔗糖业对城镇经济的推力,以及城镇经济网络对蔗糖业的拉力是不对等的。商人在晚清民国时期介入蔗糖业领域(广东可追溯到明清时期),糖商通过城镇经济网络将收购的成品糖引入流通领域,实现价值增值,丰富了城镇网络商品供应,满足了城镇居民的生活需要,因而促成了两者的楔合。然而由于历史的局限和商人惟利是图的本性,使糖商投资嗜好只注重流通领域,而忽略了对蔗糖业生产领域的投资和营造。以高利贷形式介入生产领域,造成了蔗糖业的畸形发展,也无助于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的改变,这在明清以来的广东和1930年代的广西表现较为突出。商人介入糖业领域既促进了蔗糖业和城镇经济网络的楔合,在后期又破坏了这种楔合。

第四,城镇经济网络对蔗糖业所起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为成品糖的销售通过商人的作用提供最便捷的流通渠道,通过流通领域促成蔗糖业的资金回笼。蔗糖业生产所需的肥料、品种引进,机器设备,技术人员流动等都需城镇网络来进行。另一方面,在洋糖洋货倾销国内市场过程中,城镇经济网络又是最方便的渠道。市场上洋糖土糖的质量对比,直接影响了城镇居民的消费心理和消费取向,使土糖市场萎缩,进而影响蔗糖业可持续发展。

第五,20世纪30年代两广蔗糖业的现代化尝试,既是两广地方实力派为了维护利权的最先尝试,同时也是土糖被洋糖冲击走向衰落而付出代价的理性反思和回应。由于国民党中央政府的软弱和一贯铲除异己势力的做法,使糖业现代化缺乏中央政府的宏观统筹规划,两广地方实力派欲借推动蔗糖业现代化来增强实力(如食糖专卖等)与中央抗衡的双重目的又决定了糖业现代化是短视行为。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都把发展蔗糖业作为增强经济实力以对抗中央的临时举措之一,必然缺乏通盘考虑。如陈济棠最初制定《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中并没有发展糖业内容,后来省府主席林云陔向陈推荐了农业专家冯锐,冯对《三年施政计划》进行修改,补充了《复兴广东糖业三年计划》[47]。又如广西历年经济建设费只占总支出的6% -7%之间,1935年只有4.6%[48]5,而同期军事建设费却占总支出的40%以上[49]93。两广实力派的政策重心在于发展军事力量和巩固地方统治,因此对生产周期长、见效慢的蔗糖业投入的人力物力不够,加上20世纪30年代晚期中日战争影响,时间短促,蔗糖业现代化的绩效有限,对城镇经济网络的推动效应是不明显的。

总之,蔗糖业和城镇经济网络的楔合是建立在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之上的。在蔗糖业未充分发展和城镇经济网络扩张没达到一定程度之前,在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和蔗糖业生产用水以及食糖运输等都受制于大江大河期间,两者的楔合是主要的。由于晚清民国时期不合理制度安排,战乱频仍,自然灾害,生产力水平不高等,因此在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下,两广蔗糖业发展总体上落后,难以取得生产发展质的突破,并且发展不平衡,给城镇经济网络提供商品糖的数量是有限的。城镇经济网络的商品流通性大于生产性特征,又使得其对蔗糖业的拉力是弱小的。外力的冲击和内力的作用,造成了蔗糖业的衰落,而后才有20世纪30年代的蔗糖业的现代化尝试,尽管绩效不大,但毕竟标示着两广蔗糖业迈出了现代机器生产的步伐。晚清民国时期两广蔗糖业和城镇经济网络的发展和楔合

都呈现出明显的剃度差异特征。今后广西经济重心应该向广东靠拢，自觉接受粤港澳经济走廊序位辐射。建立珠江流域经济发展社区，营造西江流域巨型城市走廊，加强两广之间经济文化等全方位的交流与合作，是近代历史给予的启示，也是广西现实的选择。

参考文献：

[1] 政协四川省委员会，四川省省志编辑委员会编. 四川文史资料[M]. 成都：1964：13.
[2] 覃乃昌. “蔗”“糖”考－兼论壮侗语民族对我国蔗糖业的贡献[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6，(3).
[3] 黄　滨. 近代粤港客商与广西城镇经济发育[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4] 司徒尚纪. 岭南史地论集[M]. 广州：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4.
[5] 罗一星. 清代前期岭南二元中心市场说[J]. 广东社会科学，1987，(4).
[6] 张松岳. 琼州府志[M]. [出版地不详]：光绪十六年刊本.
[7] 屈大均. 广东新语. 卷二十七. 草语[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8] 李调元. 南越笔记[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
[9] 周正庆. 清代广东糖业国内营销网络试析[J]. 广东社会科学，2000，(4).
[10] 政协阳春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阳春文史资料[M]. 广东阳春：1994：17.
[11] 政协潮安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潮安文史[M]. 广东潮安：1997：2.
[12] 政协英德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英德市文史资料[M]. 广东英德：1995：10.
[13] 政协东莞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东莞文史[M]. 广东东莞：1999：30.
[14] 张红华. 吴城兴衰始末[J]. 东西地方志通讯，1986，(4).
[15] 周正庆. 清代广东民俗岁时用糖探究[J]. 广东社会科学，2005，(5).
[16] 惠城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惠城文史[M]. 惠州：2001：17.
[17] 冼剑民，谭棣华. 明清时期广东的制糖业[J]. 广东社会科学，1994，(4).
[18] 华松本. 百色厅志[M]. [出版地不详]：光绪十七年刊本.
[19] 文德馨，等. 郁林州志[M]. [出版地不详]：光绪二十年刊本.
[20] 谢启昆，修，胡　虔，纂. 广西师大历史文献研究室点校. 广西通志[M].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
[21] 罗一星. 试论清代前期岭南市场中心地的分布特点[J]. 广州研究，1988，(9).
[22] 钟文典，主编. 广西近代圩镇研究[M]. 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1998.
[23] 莫炳奎. 邕宁县志[M]. [出版地不详]：民国 26 年铅印本.
[24] 政协南宁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南宁文史资料[M]. 南宁：1993：16.
[25] 梁崇鼎，等. 贵县志[M]. [出版地不详]：民国 23 年铅印本.
[26] 龙泰任. 融县志[M]. [出版地不详]：民国 25 年铅印本.
[27] 广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广西通志[M].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
[28] 萧殿元，等. 榴江县志[M]. [出版地不详]：民国 26 年铅印本.
[29] 李繁滋纂. 灵川县志[M]. [出版地不详]：民国 18 年石印本.
[30] 广西省政府统计处编. 广西年鉴[M]. 南宁：1935.
[31] 玉昆山. 信都县志[M]. [出版地不详]：民国 25 年铅印本.
[32] 彭泽益，主编.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M]. 上海：三联书店，1957.
[33] 千家驹，等. 广西省经济概况[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34] 高劳节，译. 支那研究. 中国之糖业[J]. 东方杂志.
[3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36] 许喜文，等. 民国时期广东甘蔗栽培演变的动因及历史作用[J]. 农业考古，2006，(4).
[37] 政协广东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广东文史资料[M]. 1963.
[38] 政协揭阳市榕城区文史编辑部. 榕城文史[M]. 广东揭阳：1999：5.
[39] 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 岭峤拾遗[M]. 广州：1994.

[40] 刘钦晏.一年来广西之农业推广[J].农业推广通讯,1934.
[41] 政协贵港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贵港市文史资料[M].广西贵港:1995.
[42] 钟文典,主编.广西通史,第二卷[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
[43] 钟文典,主编.广西通史,第三卷[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
[44] 赖彦于,主编.广西一览[M].南宁:广西印刷厂,1935.
[45] 陈 晖.广西交通问题[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
[46] 广西统计局编.晚清和民国时期广西统计资料摘编[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
[47] 吴建新.试析近代工业和近代农业的关系—以近代广东的蔗糖业为例[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
[48] 广西省政府建设厅统计室编.广西地方经济建设费各年度支出比较[M].南宁:1943.
[49] 广西省政府十年建设编纂委员会编.桂政纪实[M]. 南宁:1943.

Study on the Sugar and Urban Economic Network of Interaction for Guangdong and Guangxi in the Period of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MinGuo

TANG Xian-ming
(*School of History & Culture (Tour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external and internal forces, the sugar industry and the urban economic network in Guangdong and Guanxi province has experienced the stages of prosperity, decline and rise. The businessmen's involvement helped the combination of the sugar industry with the urban economic network. Because of historical and qeoqraphical reasons, Guangdong's sugar industry and urban economic network was more developed than thet of Guangxi, and it formed a strong influential factor on that of Guangxi.

Key Words: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MinGuo; Sugar; Guangdong and Guangxi; Towns Network